

云南民族地区社会分层与义务教育机会获得研究

——基于测量工具的视角

吕国光, 刘伟民

(云南民族大学 教育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31)

摘要: 阐述了云南民族地区社会分层与教育机会获得的概况, 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原理, 系统研究了义务教育机会获得影响云南民族地区社会分层的内在机理, 结果表明: 城乡结构、单位性质、民族类别及性别属性的制度性因素存在显著性差异, 而其中职业职务、工作财产、教育投入、人际关系、政治面貌及宗教信仰的先赋性因素显著性呈现递增的趋势, 进而累积在义务教育资本周转后的后致性因素发展中。

关键词: 民族地区; 社会分层; 教育分层; 义务教育; 机会获得; 结构方程

中图分类号: G40-0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627 (2012) 04-0019-07

一、云南民族地区社会分层与教育机会获得概况

教育分层(特别是作为基础的义务教育)是社会分层的一个客观现象。不合理的教育分层会影响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发展。1949年以来, 云南民族地区^①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相对单一的阶级阶层状况向多元化的阶级阶层状况转变, 其间的阶层壁垒开始消解, 层际流动呈现递增的趋势, 阶层结构越来越具有开放性, 阶层间的经济、文化及社会地位等差异也开始逐步扩大, 并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陆学艺以职业分类为基础, 以组织、经济和文化资源占有状况为根据, 将中国社会划分为十个阶层, 并且认为“中国现代的社会阶层结构中社会阶层位序已经确立”。^[1] 伴随着中国社会急剧转型而来的阶层差异逐步扩大, 对义务教育机会的获得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1978年以前, 云南民族地区拥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人, 可能与其亲人获得过较高水平的教育或拥有较高的职业地位有关。而在1978年以后, 经济增长成为最主要的追求目标, 这种家庭背景与个人教育机会获得之间的联系逐渐弱化了。人们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一

种激励机制。教育的主要功能是为经济增长选拔培养人才。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改革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是大众化教育模式向精英化教育模式的转变。这种转变对于农村和贫困地区以及城市贫困家庭和父母文化水平较低家庭的子女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他们往往成为被淘汰的对象。其次是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义务教育的市场化导致了地区之间和不同家庭经济背景的学生之间义务教育机会获得的不平等。此外, 云南民族地区一些制度特征对人们的义务教育机会也有影响, 特殊的制度设置使人们享有极其不同的义务教育资源(例如景颇族的山官制度及傣族的寺庙教育等)。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 这些制度因素对社会经济资源(包括教育资源)配置的影响力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增强, 它们也导致了义务教育机会获得的不平等。这一系列的重大政策调整, 使义务教育的培养机制和机会获得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 在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背景下, 云南民族地区中小学布局调整已经开始, 促进本省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的发展越来越成为该省基础教育发展的关键环节与基本途径。从当前的实际效果来看, 在国家教育部的大力推动下, 云南

收稿日期: 2012-02-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0XJZ0041); 云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GY100011)

第一作者简介: 吕国光(1971-), 男, 甘肃平凉人, 博士后/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教育学原理, 教育社会学。E-mail: 45033613@qq.com

民族地区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初见成效,但义务教育仍然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这一方面有云南民族地区学校发展过程中自身难以克服的痼疾,另一方面也有该地区社会各阶层资源占有不均的现实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地区义务教育的质量与效益,进而影响了现阶段该地区中小学生的健康成长。然而1949年以来,云南民族地区社会结构的分化或者说阶层差异的扩大是否对义务教育阶段不同同期群的教育机会获得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果是,这种影响究竟有多大?既有的阶层差异是通过什么方式与途径影响其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机会获得的?同一时期不同阶层的同期群与不同时期不同阶层的同期群及其现阶段中小学生的义务教育机会的获得如何?哪些因素影响了其义务教育机会的获得?云南民族地区社会分层与义务教育机会获得的内在机制关系等是本研究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二、研究方法

(一) 变量的介绍

1. 因变量与自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与自变量为:(1)家庭结构:指被调研对象现在家庭人口的多少及是否是单亲家庭(对于单亲家庭的测量主要是通过随机抽样的访谈而得之);(2)学校类型:被调研对象在其相应的义务教育阶段时所在读的中小学校的类别(如乡村小学,市重点小学等);(3)城乡结构:被调研对象在其接受义务教育时期其家庭是农村户口还是城镇户口;(4)职业类型:被调研对象的工作性质,已经退休的以退休前的职业为准;^②(5)资产状况:主要是指被调查家庭的固定资产的状况(如房产的多少,有无电视机、洗衣机等,对应的能代表其社会阶层的财产);(6)教育投入:教育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子女义务教育的经费投入,即金钱方面的投入;二是对子女情感方面的投入(如每个星期带其子女去游乐场的次数等);(7)家庭文化:主要指被调查者家里藏书的数量及子女的长辈的文化程度;(8)教育期望:父辈对子代的教育要求,即希望自己的子女到达什么样的文化程度或将来从事什么类型的职业;(9)社会关系:父辈社会的亲戚朋友关系网络(如部分父辈社会

的亲戚有很高的职务,可以为其相应的亲戚的子女选择较好的学校就读,占有优质的义务教育资源等);(10)政治面貌:是一个相对重要的区分中国人求职中的选择因素,在研究中民主党派赋值为“0”,中国共产党员赋值为“1”。在本研究中控制变量与虚拟变量:控制变量中以年龄为连续变量,研究中涉及到1978年以来不同阶段的同期群,故此变量在统计分析时不做过多的解释;性别以女性为参照类;民族以汉族为参照类,同时根据不同时期来界定不同阶层的同期群;家庭阶级成分为虚拟变量(如文革期间被划为的右派的人们等,对其编码时赋值为“0”,在统计分析时只做参考,不做分析)。同时在对云南民族地区的入户调研中(图1),涉及县市33个,以楚雄市为最多,为159户;绿春县及南涧县为最少,各自为1户,而相对较少的县市有永仁县调研9户、元谋县6户、牟定县5户及南华县4户。涉及乡镇区106个,例如698台区4户、阿德镇10户、拉乌乡12户、南沙镇22户及勐罕镇38户等。在云南民族地区取样较为全面、较为均衡、涉及面广,充分保证了科学研究的准确性及可验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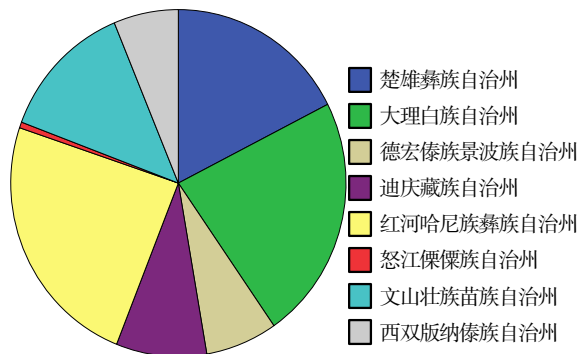


图1 云南省八个民族自治州样本分布

2. 民族的分布

在本研究中被调研者虽然居住在云南民族地区,但其民族类型的构造还是以汉族为主题(图2),汉族472人,占总体被调研者的32.40%,以楚雄彝族自治州和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两州最多,分别为143人及116人,而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仅仅为1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仅为2人。其次为彝族285人,占总体被调研者的19.56%,统计显示彝族分布较为特殊,按照常理楚雄彝族自治州应该是被调研者彝族最

多的地区,而事实上是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为120人,比楚雄彝族自治州多出34人,其他各地州相对较少,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及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均为0人。而后是傣族119人,占总体被调研者的8.17%,其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有88人,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有19人。苗族有109人,占总体被调研者的7.48%,以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51人及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50人调研相对较多,剩余其他各地州人数均在50人以下,除景颇族6人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外,其他各州民族分布相对均衡。^[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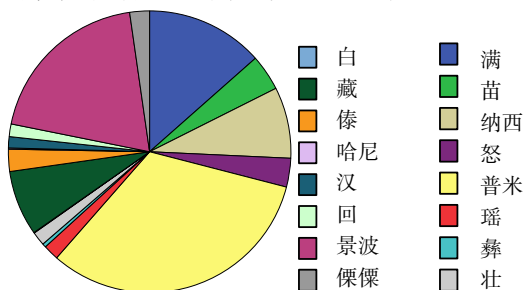


图2 云南省八个民族自治州调研民族分布

(二) 测量的方法

1. 生存分析

对于在本研究中的生存分析,首先比较使用截取正态回归模型和COX比例风险模型来测定1949年以来,云南民族地区不同阶层的同期群与义务教育机会获得发展的状况,自变量(包含家庭类型、祖父母是否在场、同胞规模、父母教育水平、父母对子女教育期望、父母职业岗位的职务、父母工作单位部门、城乡二元结构、党员)等九项指标。其分析的数学统计原理为然后,运用AMOS模型及Logistic回归方程模型分别验证上述层面的各个因素和该地区改革开放以来不同阶层的同期群与义务教育机会获得评价指标之间是否存在因果联系,如果存在因果联系,其作用路径是什么,是否以社会分层与义务教育机会获得的关系为中介。问卷包括校长访谈、教师访谈、学生问卷,家长问卷。

2. CFA与EFA分析

在编制出云南民族地区不同阶层的同期群与义务教育机会获得的评价指标后,对于社会分层与义务教育机会两个潜在变量进行EFA分析之前要对模型是否违反估计进行检验,模型违反估计的常见状态为:(1)是否出现负的误差方

差,如果其值为负数,表示违反估计;(2)协方差间标准化估计值的相关系数大于1,是不合理的参数;(3)协方差矩阵或相关矩阵不是正定矩阵;(4)标准化系数超过或非常接近于1;^[3]

(5)出现非常大的标准误或标准误为极小的数值,造成相关参数的检验统计无法被定义。^[4]同时对指标(家庭类型、祖父母是否在场、同胞规模、父母教育水平、父母对子女教育期望、父母职业岗位的职务、父母工作单位部门、城乡二元结构、党员等)测量工具进行统计分析和修订,基本步骤为:(1)编制测量工具,收集云南民族地区社会分层与义务教育机会获得样本数据;(2)对该评价指标进行相关分析,检验其是否相互独立;(3)进行因子分析,计算因子负荷表;(4)根据因子负荷表,对该指标进行归类合并;(5)对新形成的指标类别进行相关分析,检验其相互独立性;(6)修订出新的云南民族地区不同阶层的同期群与义务教育机会获得的评价指标工具。总之,在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分层与义务教育机会获得测量工具内部一致性信用度用Cronbach的Alpha系数进行评估。^[5]对各题项进行信度分析,问卷经过预测及反复修订后,再次征求项目专家的意见并修订,表明该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水平。同时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CFA)评估问卷的结构效度,建立相应的测量模型。首先检测估计参数的合理性,确保其标准误差在允许的范围;其次检测社会分层与义务教育机会获得各影响因素的多元相关系数的平方(R^2)及相关观察变量的决定系数;最后检测具体的模型拟合指标,然后用单因子变异分析检验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分层对义务教育机会获得影响;用多元回归分析探究义务教育机会获得对社会分层影响的主要干预变量。同时在正式调查前,对所有参与调研的人员进行相关培训,问卷的测量与收集采用集体施测的方式,到相应学校的班级进行现场填写与访谈,对于问卷进行当场收回,进而保证了本次调研的测量工具具有良好的效度(例如:在民族地区的村寨等边疆偏远山区进行访谈时,所带去的向导一般为调研者所在大学的相应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在校本科生,可进行相应的各自民族语言与普通话的相应的翻译交流)。

3. 访谈解析

研究者按照“独立性原则”,在现状调查的基础上,设计出云南民族地区不同阶层的同期群与义务教育机会获得的指标体系,使得该体系同级指标之间相互独立,没有相互影响,即评价对象的一项指标表现水平高,其它指标表现水平不一定高;一项指标表现水平低,其它指标表现水平也不一定低。用统计学术语来表述,就是指一个评价对象代表性样本各项指标的评定结果之间相关关系不显著。对云南民族地区社会分层与义务教育机会获得的半结构式访谈资料的解析(半结构式访谈能获得客观的结果,又具有深度,因此能搜集到其他方法很难获得的有价值的资料^[6]),以 Lincoln & Guba 的建议为基点:首先是在访谈结束后的 10 天以内,把谈话的录音由工作人员撰写成书面资料(没有录音资料的访谈者,其材料根据当时调研访谈时的记录整理),撰写好的资料再由二审及三审的编码工作人员根据录音进行逐一核实;其次对于整理好的书面资料进行分类(比如不同年代的同期群要单独整理,分类归档以备以后对比分析所用),为深入分析奠定基础;最后对各分类资料进行整合解析,根据其概率出现的频次估计其各因素的相关程度,并确定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7]进而保证云南民族地区社会分层与义务教育机会获得访谈资料的信度与效度。

三、结论

本研究以云南民族地区的 1457 名中小学生的家庭为研究对象,通过入户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影响民族地区社会分层与义务教育机会获得的各因素进行了探讨,并在定量研究及定性研究(以定量研究为主)的基础上得出了研究结论:

(一) 制度性因素

1. 城乡结构

在被调查的 1457 名中小学生家庭中,在 1949 年到 1978 年之间,祖父母及外祖父母获得的义务教育水平对被调研中小学生的父母阶层地位有着重要的影响,其中户籍的城乡二元结构在这段时间内并不显著。例如祖父对父亲的影响为村落($P=0.012$)、乡镇($P=0.020$)、城市($P=0.017$)及农区或农牧混合区($P=0.024$)。而 1978 年以来,被调研中小学生的父母阶层地

位对被调研中小学生的义务教育机会获得的户籍存在显著影响,父亲对被调研中小学生的影响为村落($P=0.002$)、乡镇($P=0.005$)、城市($P=0.001$)及农区或农牧混合区($P=0.007$),并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

2. 单位性质

单位性质是一个重要的影响指标,在 1949 年到 1978 年之间,祖父母及外祖父母的义务教育水平对父亲及母亲的阶层职业单位的影响并不显著,例如祖父单位为私营企业主对父亲的职业期望呈现低相关($R=0.42$);祖父职业商业服务行业等服务人员对父亲的职业期望呈现弱相关($R=0.22$)。而 1978 年以来发生了重大变化,父母的阶层地位对被调研的中小学生的义务教育水平影响显著,例如父亲单位为私营企业主对被调研中小学生的选择重点中小学呈现显著相关($R=0.54$);父亲单位商业服务行业等服务人员对被调研中小学生的选择重点中小学也呈现显著相关($R=0.52$),逐渐呈现增强的趋势。

3. 民族类别

在民族类别的分析中存在差异,1949 年到 1978 年之间,少数民族由于客观历史的原因其义务教育水平(26.19%)逐步增长,但总体还是低于汉族 4.27%个百分点,而在少数民族属性的分布,各地州也存在差异,楚雄彝族自治州(42.14%)高于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2.67%个百分点;汉族的分布也存在这样的趋势。自 1978 年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虽然少数民族的义务教育水平逐步提高,但总体还是低于汉族的义务教育水平。

4. 性别属性

在性别属性的分析中也存在差异,在云南民族地区,男性的受义务教育权利(62.46%)明显高于女性 6.28%个百分点。而少数民族女性(46.14%)低于男性 3.23%个百分点;汉族男性(68.19%)高于女性 2.58%个百分点。而自 1978 年以来,在调研过程中,发现义务教育机会的获得即子代义务教育机会获得的受教育权存在性别差异的趋势增强,以被调研中小学生的男性为参照,在云南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男性的受义务教育权利(58.15%)明显高于女性 2.72%个百分点;汉族男性(76.15%)高于女性 2.19%个百分点(调

研访谈中可知,大部分调研者都是主张男女平等)。

(二) 先赋性因素

1. 职业职务

职业与职务是影响人们社会分层与义务教育机会获得的显著性指标。在1949年到1978年之间,祖父接受6年义务教育的对父亲学历期望是大专及以上居多,占46.13%;祖母接受6年义务教育的对父亲学历期望是大专及以上居多,占42.10%。祖父没有职务对被调研中小学生的父亲职务期望呈现低相关($R=0.42$);祖母没有职务对被调研中小学生的父亲职务期望呈现弱相关($R=0.27$)。而在1978年以后,例如祖父接受9年义务教育的对父亲学历期望是大专及以上居多,占64.27%;祖母接受9年义务教育的对父亲学历期望是大专及以上居多,占59.21%。父亲没有职务对被调研中小学生的职务期望呈现显著相关($R=0.61$);父亲职务村长(主任)对被调研中小学生的职务期望呈现显著相关($R=0.50$),其各因素之间的拟合回归线如图3所示。

2. 工作及财产

工作及财产也严重影响民族地区人们社会分层与义务教育机会的获得。在1949年到1978年之间,人们父辈的财产状况又与其现在的工作状况紧密相连。通过调研中的访谈可知,在城市及乡镇的人们财产相对较多较丰富,其工作也往往相对于较为理想,或者已经退休;而生活在村落或农牧区的人家庭仅仅有供给自己生活所需的必需品外,并无额外财产,往往是进城打工(经常失业)或在家里全职家务,在1949年到1978年之间这种现象虽然存在,但并不是很突出,计划经济的供需分配原则是影响其较为突出的因素。而1978年以来,父母的家庭财产逐渐影响其子代的义务教育机会获得,并呈现逐步加强的趋势。而父辈的财产状况又与其现在的工作状况紧密相连,通过调研中的访谈可知,在城市及乡镇的人们财产相对较多较丰富,其工作也往往相对于较为理想,或者已经退休;而生活在村落或农牧区的人家庭仅仅有供给自己生活所需的必需品外,并无额外财产,往往是进城打工(经常失业)或在家里全职家务,在1978年以后,市场经济的按劳分配原则是影响其较为突出的

因素。

3. 教育投入

在教育投入因素中,父辈获得义务教育水平越高,越对自己的子代获得优质义务教育的期望越高,进而父辈对其子代进行了学校的选择。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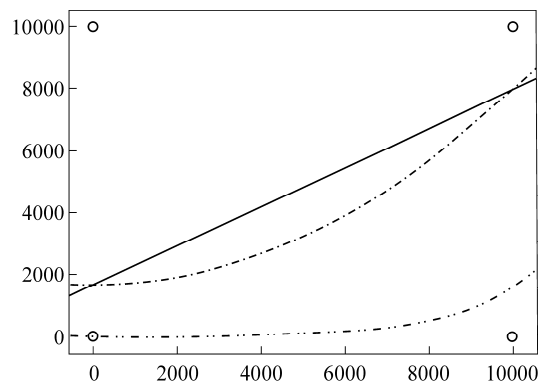


图3 父母职业拟合回归线模型

父母对父亲择校离家较近显著相关($R=0.65$);各项收费合理低相关($R=0.34$);学校声誉及等级比较高低相关($R=0.41$);重点中小学,升学率高低相关($R=0.44$);有亲人朋友在,可以照顾低相关($R=0.46$)。可见,在1949年到1978年之间主要以计划经济为主,所以祖父母对父亲及外祖父母对母亲选择学校是以现居地为主导,也就是离家较近为主导,其他原因为辅。而1978年以后统计显示,父母获得的阶层地位越高,越对自己的子代获得优质义务教育的期望越高,进而父母对其被调研中小学生的进行了学校的选择。而在对选择学校以后与学校的关系中,父母从不去参加学校的家长会弱相关($R=0.10$);每个月参加学校家长会一次显著相关($R=0.56$);半年去学校参加一次家长会弱相关($R=0.22$);从不去学校询问孩子的成绩弱相关($R=0.09$);半年去学校询问孩子的成绩一次弱相关($R=0.19$);每个星期去学校询问孩子的成绩显著相关($R=0.59$)。可见,1978年市场经济开始以来,父母对被调研中小学生的选择学校是以阶层地位资产为主导,而与学校的关系也是以阶层地位资产为主导,其他原因为辅,即阶层地位越高,为子代择校空间越大,义务教育的不公平性逐步扩大,其各因素之间的拟合回归线如图4所示。

4. 人际关系

在1949年到1978年之间,由于受计划经济的影响,人们的义务教育水平越高,周围人际关

系的职业、职务及文化程度也就越高,但对其子代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中下阶层的人际关系中,人们生活的氛围相对较为公平和谐。例如在最有可能帮助你的人的职业中,最有可能帮助祖父母家的职业为私营企业主呈现低相关($R=0.37$);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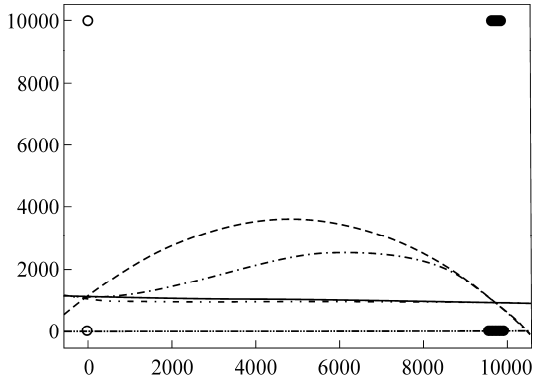


图4 父辈义务教育投入拟合回归线模型

业建筑业等产业工人呈现显著相关($R=0.56$);商业服务行业等服务人员呈现显著相关($R=0.54$);大中型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呈现显著性相关($R=0.50$)。1978年以来,受市场经济的影响,人们的义务教育水平越高,周围人际关系的职业、职务及文化程度也就越高,但对其子代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各阶层的人际关系中。被调研中小学生的义务教育机会获得逐渐变为不公平,进而影响到社会各阶层人际关系的和谐,阶层壁垒已经逐渐形成,人们的交往范围相对封闭,在最有可能帮助你的人的职务中,最有可能帮助自己家的没有职务呈现显著性相关($R=0.52$),副科(正科)呈现显著相关($R=0.54$),副处(正处)呈现显著相关($R=0.51$),副厅(正厅)及以上呈现低相关($R=0.32$),村长(村主任)呈现低相关($R=0.46$),其各因素之间的拟合回归线如图5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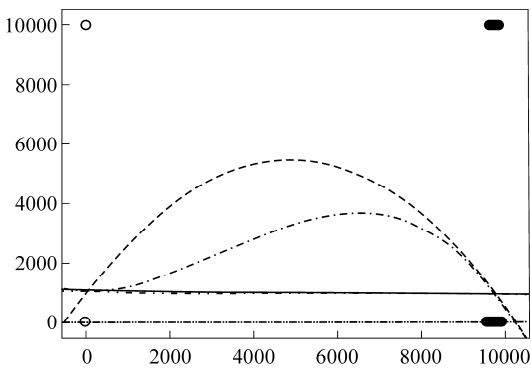


图5 父辈人际关系拟合回归线模型

5. 政治面貌及宗教信仰

在1949到1978在义务教育对政治面貌的影响中,父辈接受义务教育水平对子代的政治面貌相关。随机抽取接受义务教育为5年及1年的祖父母及外祖父母的受教育的水平获得对子代政治面貌的影响统计分析,祖父接受5年义务教育对父亲政治面貌影响为群众显著相关($R=0.51$),民主党派显著相关($R=0.50$),中国共产党党员显著相关($R=0.62$),阶层差异并不明显。而1978年以后在政治面貌对义务教育的影响中,父辈政治面貌对子代接受义务教育水平的相关。父亲为群众对被调研中小学生义务教育水平低相关($R=0.47$),民主党派显著相关($R=0.51$),中国共产党党员显著相关($R=0.66$);母亲为群众对被调研中小学生义务教育水平低相关($R=0.32$),民主党派显著相关($R=0.50$),中国共产党党员显著相关($R=0.58$),阶层差异相对明显,并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其各因素之间的拟合回归线如图6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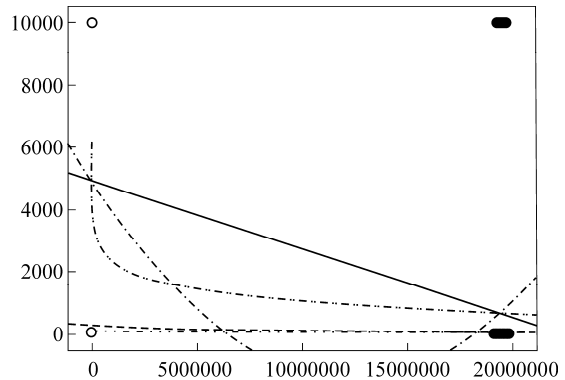


图6 父辈政治面貌拟合回归线模型

(三) 后致性因素

不管是1949年到1978年还是1978年以来,通过分析制度性因素及先赋性因素可知,父辈获得义务教育水平对子代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义务教育资本的周转周期比较长,一旦形成,就转化为潜在资源为子代服务,如城市义务教育水平较高,其对子代的学历期望也往往较高,政治面貌也往往集中于党员及民主党派。可见,在1978年以来的市场经济及社会转型时代,虽然以个人努力为主,但受父母心态人为的影响越来越突出,父辈阶层地位的获得对子代义务教育水平的获得呈现教育资本的持久性,随着社会阶层的不同其差距越来越大。

总之,结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的“优先发展、育人为本、改革创新、促进公平、提高质量”的工作方针,民族地区要根据自身发展的现实状况,合理调整社会各阶层的结构,密切关注人人接受义务教育机会的公平性,保障各阶层特别是中下阶层人们享有公平的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和机会,为社会各阶层的人们提供一个有效的义务教育机会;同时要尽量符合各阶层人们不同的需求,即让每个阶层的人们相对获得他们所需要的有效公平的义务教育机会,在民族地区办好义务教育的同时,在各族人们及各阶层人们之间全面有效地实施全纳教育,^[8]促进民族地区社会各阶层和谐发展,义务教育资源充分有效地利用,进而促进全国基础教育调整与社会进步、和谐、稳定、可持续发展。

注释:

- ① 文中所出现的边疆民族地区仅指边疆云南省八个民族自治州,分别为: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楚雄彝族自治州、大理白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及迪庆藏族自治州。
- ② 工作单位类型与工作单位部门紧密相连,在本研究的测量中以陆学艺的社会阶层划分为依据,分别为:(i)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指在党政、事业和社会团体机关单位中行使实际行政职权的领导干部;(ii)经理人员阶层,指在大中型企业中非业主身份的中高层管理人员;(iii)私营企业主阶层,指拥有私人资本和固定资产,并雇佣职工进行经营以获取利润的人员,按现行政策,雇工在8人以上的企业主称私营企业主;(iv)专业技术人员,指在各种经济成分的机构(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全民企事业单位、集体企事业单位各类非公有制经济企业)中专门从事各种专业性工作和科学技术工作的人员;(v)办事人员阶层,指协

助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专职办公人员;(vi)个体工商户阶层,指拥有少量私人资本,从事小规模生产、流通、服务业等经营活动,并以此为生的人,自己参加劳动和经营,有些还有专业的技术和手艺,有些还带一些徒弟,雇请少量帮工或不雇请帮工(不超过7人);(vii)商业服务人员阶层,指在商业、服务行业从事非专业性的体力和非体力劳动的工作人员;(viii)产业工人阶层,指在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中从事直接和辅助性生产的体力、半体力劳动的人员;(ix)农业劳动者阶层,指承包集体所有的耕地,主要从事农(林、牧、渔)业生产经营,并以农(林、牧、渔)业为惟一或主要收入来源的劳动者;(x)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指无固定职业的劳动年龄的人群。(详见: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参考文献

- [1] 陆学艺.社会学将进入大发展的黄金时期[J].甘肃社会科学,2003(4):3-4.
- [2] 张燕,刘伟民.影响民族地区家庭义务教育投入的因素探析——以云南民族地区为例[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11(11):55-57.
- [3] BYRNE B M.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with LISREL, PRELIS and SIMPLIS: Basic concepts, applications and programming[M].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98: 9-11.
- [4] BENTLER P M. EQS: Structural equations Program manual Encino[M]. CA: Multivariate Software Inc.1995: 12-16.
- [5] CRONBACH L J. Coefficient Alpha and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Tests[J].Psychometrika. 1951(16): 281-302.
- [6] BORG W R. Educational research[M].New York: Longman. 1983: 114-115.
- [7] LINCOLN Y S, GUBA E. Naturalistic inquiry. Beverly hills[M]. CA: Sage, 1985: 20-22.
- [8] 顾明远.公平而差异:基础教育的必然选择[J].教育发展研究,2007(11):7-8.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Access to Compulsory Education in Ethnic Regions

LV Guo-guang, LIU Wei-min

(School of Education, Yunnan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 Kunming 650031,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is designed to study the impacts of access to compulsory education upon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hrough presenting the status of social stratum and access to compulsory education in Yunnan's ethnic areas. The results show tha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exist in such institutional factors as urban-rural structure, unit attribution, ethnic groups and gender, of which ascribed factors like occupations, ranks, work, property, education input,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political status and religious belief are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thus accumulating in the later-induced f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capital turnover.

Key words: ethnic areas; social stratification;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compulsory education; access; structural equation

(责任编辑 夏登武)